

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

第三卷

辛冠洁 丁健生 主编

王国轩 冯增铨
李 曦 王葆琰 编

齐 鲁 书 社

一九八五年·济南

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

第三卷

辛冠洁 丁健生 主编

王国轩 冯增铨 编

李 曦 王葆玟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4.5印张 5插页 209千字
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000

书号 2206·37 (特精) 定价 5.10元

中國古代俠名
哲學家著評述

齊魯書社

目 录

盐铁论	张 烈撰 (1)
易 纬	钟肇鹏撰 (95)
白虎通	于首奎撰 (179)
太平经	王 明撰 (255)
列 子	辛冠洁撰 (329)
无能子	李 曦撰 (391)
人名索引	(427)
名词索引	(443)
后 记	(460)

盐铁论

张 烈 撰

章 目

- 一、《盐铁论》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成书过程…………… 3 (1)
- 二、《盐铁论》基本内容…………… 18(16)
 - (一) 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辩论…………… 21(19)
 - (二) 关于汉匈关系政策的辩论…………… 46(44)
 - (三) 关于施政方针的辩论…………… 62(60)
 - (四) 关于儒法二家思想评价的辩论…………… 74(72)
- 三、《盐铁论》的历史评价与今天的再评价…………… 83(81)
- 附 关于《盐铁论》的研究书目…………… 92(90)

盐 铁 论

张 烈

《盐铁论》一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入儒家类。全书分十卷六十篇，用对话体写成。它全部录入了汉昭帝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二月朝廷盐铁会议上与会者双方的两次辩论言辞，内容相当丰富，是我们今天了解汉武帝一代经济、政治、思想等各方面状况的宝贵资料。

一、《盐铁论》产生的历史 背景及成书过程

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6年灭秦，建立了汉王朝，中经惠帝、吕后、文帝、景帝四代，到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，其间六十多年。在这半个多世纪里，

汉统治者一直推行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政策，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，社会财富有了大量积蓄，因而出现了“文景之治”的封建太平盛世。所以在汉武帝即位的初年，社会景象相当繁荣。其时，“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。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

然而这只是太平盛世的一个方面。与此同时，汉王朝还存在严重的内忧外患，天下并不十分太平。其时，在汉王朝内部，同姓诸侯王势力膨胀，甚至发展到跟朝廷对抗的地步。文帝前元六年（公元前174年），淮南厉王刘长谋反未遂，废徙蜀，道死。景帝前元三年（公元前154年），又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。这次叛乱，虽历时三月平息，但诸侯王潜在的离心势力仍然存在。再有，汉王朝与周围邻国，尤其和匈奴的关系相当紧张。自刘邦采纳娄敬建议与匈奴单于建立友好和亲后，匈奴单于还是屡次背约，不断侵扰汉王朝北方边境。文帝前元十四年（公元前166年），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、萧关，候骑至甘泉，烽火通于长安。当时的政论家贾谊曾在《治安策》一文里论及上述两方面的情况

况。他就内忧方面说：“天下之势方病大瘡，一胫之大几如腰，一指之大几如股，平居不可屈伸。”就外患方面说：“天下之势方倒悬”，“今匈奴嫚侮侵掠，至不敬也；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。足反居上，首顾居下。”景帝时，内忧虽有所缓和，但匈奴为患仍然严重。因此汉武帝一即位，就面临彻底克服诸侯王分裂势力和排除匈奴侵扰的历史任务；而汉武帝刘彻，果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处理上述两大难题。

汉武帝即位的次年（建元元年，公元前140年），诏举贤良对策，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推崇《公羊春秋》大一统的学说，首先从政治思想上采取措施，加强中央集权。元朔二年（公元前127年），汉武帝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，下推恩令，使诸侯子弟毕侯，进一步分化削弱了各诸侯王国。元狩元年（公元前122年），汉武帝又及时粉碎了淮南王、衡山王的谋反阴谋，诛死数万人。元鼎五年（公元前112年），汉武帝借口列侯所献酎祭宗庙的黄金，不足数或色恶，夺爵一百六人（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，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地方分裂势力。至此，地方诸侯王势力已无力反叛朝廷，中央皇权大为加强。

汉武帝在巩固封建统治的过程中，所遇到的最为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匈奴的威胁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，

在他即位的第四年（建元三年，公元前138年），即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，为夹击匈奴作准备。元光二年（公元前133年），汉武帝部署重兵三十万埋伏于马邑（今属山西朔县附近），准备诱匈奴单于入伏就歼。结果泄密，单于走脱。汉王朝从此对匈奴开展了长时期的大规模防御战争，经过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、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、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三次大规模的出军作战，夺取了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，歼灭了匈奴的有生力量，单于远遁。自此，“漠南无王庭”（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）。汉王朝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，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，损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。至元朔六年（公元前123年）为止，汉筑朔方城已“费数十百巨万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，汉军将士所得赏金已费黄金二十余万斤，数万被俘的匈奴人也得到汉王朝的厚赏，衣食都仰赖汉王朝供给。而汉军战马死亡十余万匹，其它兵甲粮草等后勤的供应费都不在内。因此文景以来的积蓄已耗费殆尽，国家税租收入犹不足以供军用，汉武帝只好悬卖武功爵以补充收入。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，匈奴浑邪王率部来降，“费凡百余巨万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。元狩四年，卫青、霍去病出军，汉军军马损失十余万匹，粮食等其它后勤供应费用无

算，劳军赏费达五十万金，以致战士薪饷也无法开支；同时国家还有兴修水利、赈灾所花的大量费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农丞孔仅、东郭咸阳建言盐铁事业收归官营，招募煮盐商人自筹资金和劳力，公家供给工资和器具以煮盐；同时在各郡国置铁官经营冶铸铁器，不产铁的地区置小铁官经营废铁回炉。对私自煮盐冶铸者，没收其器具，左脚带上铁镣。汉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，便遣孔仅、东郭咸阳主持盐铁官营事业，在各郡国建立经营机构，授与盐铁大贾以盐铁官职。从此，大批的盐铁商贾参加了官吏队伍。三年后（元鼎二年，公元前115年），孔仅升至大农令，列于九卿。桑弘羊为大农中丞，负责会计核算，开始主办均输事业，经营各地所贡土特产的销售事宜。元封元年（公元前110年），孔仅受贬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，代理大农令，取代孔仅经营全国盐铁事业。桑弘羊向汉武帝申请派出大农部丞数十人常驻各郡国，并于各县置盐铁均输官，经营盐铁均输事宜；又在京城长安设置平准，囤积货物，贱买贵卖，垄断物价，扩大收入。同时申请官吏可入粟补官，罪人可以粟帛赎罪，因而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。因此，桑弘羊得到了汉武帝的丰厚恩赏，赐爵左庶长，黄金二百斤。

为了增加财政收入，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，御史大夫张汤建议加征工商业税，规定商人财产每值二千钱征收一算（一百二十钱），手工业者财产每值四千钱征收一算，谓之繇税。其它商人百姓车船皆征繇税。如隐匿财产不报或报不如实者，就没收其全部财产；如有检举告发者，可得没入财物之半。元狩六年（公元前117年），汉武帝令杨可主持告繇，结果“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，弄得中等以上工商业户纷纷破产。天汉三年（公元前98年），“初榷酒榷”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，汉武帝实行酒类专卖。

汉王朝政府实行盐铁官营、均输、平准、告繇、酒榷，确实搜刮到了巨额财富，尔后浩大的军费开支和其它费用，均赖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，故能贍之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；汉武帝出巡，“所过赏赐，用帛百余万匹，钱金以巨万计，皆取足大农。”（同上）但另一方面，盐铁官营等事业也产生了不少流弊，这些流弊不断发展，就成了后来召开盐铁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当卫青、霍去病几次出塞取得抗击匈奴的重大胜利后，汉王朝所受匈奴的威胁大为减少，民族矛盾大为缓和；但汉武帝并未因此休整，仍然继续征战，因

而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活：以致“父战死于前，子斗伤于后，女子乘亭鄣，孤儿号于道，老母寡妇饮泣巷哭，遥设虚祭，想魂乎万里之外。”（《汉书·贾捐之传》）加上吏治耗乱，以及汉武帝本人奢侈挥霍等原因，弄得“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，物故者半。”（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）因之农民境遇痛苦不堪，大量流亡，甚至纷纷反抗起义，阶级矛盾由是日趋激化并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。到汉武帝统治晚期，起事暴动之规模较大者，“南阳有梅兔、百政，楚有段中、杜少，齐有徐勃，燕、赵之间有坚卢、范主之属”（《汉书·酷吏传》），他们“擅自号，攻城邑，取库兵，释死罪，缚辱郡守都尉，杀二千石，为檄告县趋具食。”（同上）其它掠劫乡里者不可称数。汉武帝虽派出专使进行镇压，但起事者往往散而复聚，依阻山川，使政府官吏无可奈何；由于小吏畏惧上官督责，往往隐匿真情，粉饰太平，因此形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。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，汉武帝本人曾有所反省，因此他很赏识太子刘据仁恕温谨的气质。汉武帝曾经这样评价自己和太子说：“汉家庶事草创，加四夷侵陵中国，朕不变更制度，后世无法；不出师征伐，天下不安，为此者不得不劳民。若后世又如朕所为，是袭亡秦之迹也。太子敦重好静，必能安天下，不使朕忧。欲求守

文之主，安有贤于太子者乎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）这段话可以表明：汉武帝当时已认识到他那套现行政策在他身后非改变不可了。

太子刘据本是汉武帝十分宠爱的皇位继承人，为皇后卫子夫所生，大将军卫青的外甥，因之后人名卫太子。卫太子少时受《公羊春秋》，又受《谷梁春秋》，受儒家思想熏陶颇深。加冠后，武帝又为之立博望苑，“使通宾客，从其所好。”（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）卫太子通过与众多宾客的接触，了解到严重的社会状况，感到统治危机迫在眉睫，现行政策非改变不可。因此，他屡次劝谏汉武帝对外用兵，每当武帝出巡他代理执政时，对于苛急案件多所平反。他企图改变现行政策，考虑采取缓和阶级矛盾的办法来消弭农民的反抗和暴动，使社会秩序趋于安定，借以达到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。卫太子的这种政治态度颇得人心，因之“群臣宽厚者皆附太子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）这样，在汉朝廷内部形成一个以卫太子为中心的新政派，与汉武帝所任用的当政用法派大臣相对立。当政用法派大臣都诋毁卫太子，尤其当大将军卫青去世后，卫太子失去外家的有力支持，所受的诬陷排挤更为严重。当政用法派大臣深恐汉武帝去世后卫太子掌权时，将会失去既得的权力地位，

因之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甘心。至于汉武帝本人，一方面打算让卫太子转变政策，另一方面又让当政用法派大臣维持现行政策不变。所以当卫太子劝谏对外用兵时，汉武帝笑答：“吾当其劳，以逸遗汝，不亦可乎！”（同上）当卫皇后告诫卫太子必须“留取上意，不应擅有所纵舍”（同上）时，汉武帝又“是太子而非皇后”（同上）。他这种倾向于太子而又自相矛盾的政治态度，也就更加激起当政用法派大臣的恐惧和嫉恨。太子派和当政用法派矛盾的不断积累，终于通过征和二年（公元前91年）的“巫蛊”事件爆发为激烈的冲突。

征和二年，当政用法派红人江充诬陷卫太子用巫蛊术诅咒了汉武帝，卫太子在无以自明的情况下被迫造反，捕斩江充，并矫诏发兵与丞相刘屈氂的军队在长安血战五天，“死者数万人”。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结果卫太子一方失败。他一家除了一个出生数月的孙子（即后来的汉宣帝），因得到太子派官吏丙吉的保护而倖存外，其余全都死难。卫太子的宾客，除张贺一人因其兄安世向武帝说情被轻处宫刑外，其余全被斩决。“巫蛊”事件不仅使卫太子一派势力受到巨大打击，而且也使汉武帝本人受到巨大震动。次年（征和三年，公元前90年），李广利败降匈奴，再次使汉武

帝受到震动。“巫蛊”事又多按验不实，高寝郎田千秋乘机上书为卫太子鸣冤，使汉武帝明白“巫蛊”事件原系一大冤案。汉武帝醒悟过来，诛杀一批陷害卫太子的当事人；且作“思子宫”，并在太子死事处建筑“归来望思之台”，以示哀悼。

悲剧性的“巫蛊”事件，促使汉武帝迅速接受卫太子的政治观点，下决心调整现行政策。征和四年（公元前89年）三月，汉武帝自我反省道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事有伤害百姓，靡费天下者，悉罢之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二武帝征和四年）且随即罢免诸方士候神人者。同年六月，当政用法派大臣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、御史奏言调集人力赴轮台屯田，汉武帝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，因之下诏道：“乃者贰师败，军士死略离散，悲痛常在朕心。今请远田轮台，欲起亭隧，是扰劳天下，非所以优民也，今朕不忍闻。大鸿胪等又议，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，明封侯之赏以报忿，五伯所弗能为也。”因而决定：“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，修马复令，以补缺，毋乏武备而已”。（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轮台哀痛之诏”。当轮台诏令发布以后，即不复出军，而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，以休养生息、思富养民号召天下。又以赵过为搜

粟都尉，推广代田法和便巧的耕耘下种田器，农民因之用力少而得谷多。

轮台诏令是汉武帝调整现行政策的一个重大标志：从此即由劳师动众转入息民重农（“力本农”），由严刑酷罚转入宽刑省罚（“禁苛暴”），由横征暴敛转入轻徭薄赋（“止擅赋”）。汉武帝确定此新政策不久，当后元二年（公元前87年）临死时，即拜“出入禁闼二十余年，小心谨慎，未尝有过”（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）的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，受遗诏辅少主昭帝，与车骑将军金日磾、左将军上官桀、丞相田千秋、御史大夫桑弘羊共掌朝政，执行轮台诏令所规定的新政策。由于上述历史原因，此时桑弘羊仍站在原来政策的立场上，与霍光唱反调，死死抱住轮台诏令以前的老政策不放，抗拒执行轮台诏令。他对当时民族矛盾趋于缓和、阶级矛盾急剧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基本社会状况视若无睹。桑弘羊是在汉武帝前期政策实施中发迹的显赫权贵，是工商业奴隶主和官僚大地主的利益的重要代言人。由于轮台诏令的实施，妨碍了这一阶层人物的仕途发展和扩大财源收入；而且这些人身居社会上层，并不直接身感农民暴动的威慑。桑弘羊就从这批人的政治立场出发，反对轮台诏令的实施，因而成了霍光的政敌。当时，霍光